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 编



大江健三郎文学研究

2006 论文集

陈众议 莫言 许金龙等 著

65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 编



大江健三郎文学研究

2006 论文集

陈众议 莫言 许金龙等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江健三郎文学研究：2006 论文集 / 陈众议等著 .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306-4951-0

I. 大… II. 陈… III. 大江健三郎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I313.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155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9.375 插页 7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大江的爱

——代序

陈众议

2001年8月23日,笔者和黄宝生先生、许金龙先生抵达东京。适逢第十一号台风在日本登陆。于是日本友人便戏称我们为“台风人”。第十一号台风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飞沙走石摧枯拉朽,却也是绵绵淫雨令人扫兴。然而,奇怪的是我们驱车前往大江先生的东京外别墅时,天空竟开,太阳嬉皮笑脸地从云翳的高处探出头来,一路陪伴着我们。

大江先生早早地站在宅外的林间小道上,没等汽车停稳,便迎上来与我们握手寒暄。先生还是旧模样。他身着便装,清癯的脸上洋溢着诚挚的微笑。他热情地介绍了他的妻子和儿子,然后就滔滔不绝地回忆起2000年9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成功访问北京的情景。他记得北京一位网民友善而坦诚的提问:“大江先生,您为什么这么土?”也记得西单图书大厦读者的热情包围和北京小胡同里的豆浆油条。当许金龙先生把《环球时报》编辑的一本《20世纪外国文学回顾》转赠与他时,他的脸上更是漾起了激动。他多次表示,对北京的访问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一年来,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京,用所见所闻告诉日本人民:中国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而积极的变化,他在那里感受到了蓬勃向上的气息和人们发自内心的喜悦,看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精英。此后,他还就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无视历史、无视现实的又一明证。为此,他曾在国会议事堂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当众

抗议日本政府的错误行径,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制止删改历史教科书,真诚地向亚洲各国赔罪,以求得到亚洲人民的宽恕。

是年,大江先生正在创作《两百岁的孩子》。我说这不是“东方版《堂吉诃德》吗”?他忙不迭点头称是。我们真诚地希望先生的理想主义和他的这一个堂吉诃德可以创造“战胜风车”的奇迹。

先生侃侃而谈,并不时地朝儿子光投去关切、慈爱的目光。光回以安宁、欣慰的目光。

三个小时似白马过隙匆匆而去。大江夫人忙里忙外为我们准备了“中国包子”和各种小吃。大江先生抚今追昔意犹未尽,他为自己的中国之行、为自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在恋恋不舍中走出大江先生的别墅。它和他的主人一样,显得那么朴质、那么敞亮。还有三十年前的旧烟囱、很不起眼的门牌及门前的参天大树和这种朴质、敞亮构成了大江及大江家的独特风景。

告别时分,大江一手拉着夫人,一手挽着儿子。大江光依偎在父亲身上,用稚嫩的中文怯生生地说着“你好”和“再见”。

这情景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话,谓“在上则人咸戴焉,在下则人咸亲焉”。我还由此想到了大江的爱国之心。事实上,大江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深爱日本,却不被大多数日本人所理解。他说过,日本只有承认历史、与中国及亚洲各国修好,否则便是死路一条。且不说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在当下,在全球化乃至未来跨国资本主义语境中,大江先生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是吗?资本主义从地区垄断、国家垄断,已经发展到了国际垄断。从远的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预见和描绘过这一趋势,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就近而论,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于1973年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称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首先是资本型经济取代生产型经济,其次是服务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此外,贝尔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认为和意识形态对峙犹如传统殖民方式,正明显阻碍生产力的发展(1960:《意识

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即便白宫并未从一开始就接受贝尔的意见,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美国政府明显开始两条腿走路,即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有意放松了经济及意识形态的控制,为冷战时期乃至六十年代的内部对峙(如在越南战争、代沟、学潮等问题上对抗)和七十年代的反共政策蒙上了面纱。九十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全面接受了贝尔们的思想,在“淡化”意识形态、加强跨国资本运作的同时,开始实施“信息高速公路”战略。于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一日千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利润奇迹并使世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而这个表面上多元、相对的时代,恰恰是跨国资本得以长足发展的时代,也是它一元统治的时代。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才可能出现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论条。它使得“冲突”(或“文明冲突”论)者显得多么的背时悖道。

日本作为世界一大资本输出国,只有在和平、和谐状态下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于人利,于己更利,何乐而不为?

大江先生不寻常、不苟且,他是有洞见的,有远见的;对家人、对日本、对世界更是充满了仁爱之心。然而他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是注定不会被短见短视的日本右翼势力理解和接受的。这是大江的悲哀,也是日本的悲哀。

以上是我访日回来的一段记叙,却时虽过境未迁。2006年大江先生再度访华,还是那个质朴,那个友善;见到新朋老友,也还是那个热情,那个由衷。而眼前我们这个小小的研究成果,正是对大江为人为文的一次小小的解读,蕴涵着外文所同人对他的由衷的钦佩。

2007年11月于北京

目录

- 001 大江的爱(代序) 陈众议
- 001 北京讲演二〇〇六 大江健三郎 李薇译
- 012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大江健三郎 许金龙译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演讲
- 023 年轻一代参与的意义 大江健三郎 许金龙译
——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 026 童心新说 陈众议
——评《愁容童子》与《堂吉诃德》及其他
- 035 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 莫言
- 043 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叶渭渠
- 051 “大江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几点启示 阎连科
——在中国“大江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 056 大江健三郎——当代杰出的人道主义作家 吴岳添

目 录

067 回归与拯救

李永平

076 大江健三郎与俄国文学观念

吴晓都

085 大江健三郎文学里的中国要素

许金龙

095 互文性、信仰及其他

——读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

陆建德

110 二十一世纪的必读书——大江健三郎的小说

小森阳一 秦岚译

118 恐怖的“日内瓦指令”:从莫斯科到东京

——《群魔》和《别了,我的书!》对“日内瓦指令”的讽喻

万海松

132 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探索与写作实践

——试析大江健三郎的早期思想与创作

王中忱

141 致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信

魏 巍

北京讲演二〇〇六

大江健三郎

李 薇 译

—

这次能够到北京访问，是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承蒙我所崇敬的、思念的朋友们的邀请。我由衷地珍惜这次访问，感到格外兴奋。他们为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作家，准备了我所期待的最丰富的日程。

我是已经七十一岁的作家了，如果我想再次访问中国的话，也许只有陪伴家属进行私人旅行的机会了吧。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二十五岁那年，刚刚成为一名作家。其实，在日本文学代表团里，与其说我是作家，不如说我仅仅是一名成员而已。那是1960年6月的事情了。

那一年，在日本连续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大游行，抗议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位为军事条约。当时我认为，日本在亚洲的孤立，意味着我们这些日本年轻人的未来空间将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为年轻团员吸收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文学家代表团里。

由于这个代表团的性质，日程里安排了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当然，对于我来说，其实只是在稍后的席位上看着团里的主要成员与领导人对话。对于热衷阅读中国现代史的我（现在上了年纪，回过头看自己，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除了读书，就是用于写书了）来说，在那个位置上仔细眺望中国的历

史伟人,觉得他们犹如茂密森林中的参天大树。在这里特别想告诉大家,我这个人最爱的,就是书和树。

下面我引用自己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作为伟大的历史象征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请允许略去敬称。我当时写道: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还有文学家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那是多么茂密的森林啊!

在北京逗留期间的一天,这些伟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经非常和蔼、可亲地主动与我交谈。我们在北京逗留的六月末,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机动队^①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一行人最后面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习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着闻名遐迩的烤鸭连一口都没咽下。

当时,我想起了鲁迅的文章。这是指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事件。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组织了游行示威,在国务院门前与军队发生冲突,遭到开枪镇压,四十七名死者中包括刘和珍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两名学生。后面我还要讲到是什么契机使我从鲁迅文集中摘录了“希望”这个词汇。我回忆着抄自《华盖集续编》(翻译这本书的,是曾经和我一起参加过东京游行的竹内好)的一段话,看着周总理,我感慨万分,眼前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

鲁迅是这样讲的: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

① 相当于武装警察。——译注

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色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那天晚上，我的脑子里不断出现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点儿食欲。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到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想，即便像我这种鲁迅所说的“碌碌无为”的人，也应当做点儿什么，无论怎样，我要继续学习鲁迅的著作。我当时还希望，我不应当再让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为了我花费他宝贵的任何一分钟。后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

二

这个开场白可能长了些，说这些也是为了向社科院表示感谢，因为大家为我安排的整个日程遵循了我的原则，体现了我的愿望。

首先，日程中包括了和北大附中学生对话的机会。我是个作家，对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子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令我如何爱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从中又接受了哪些影响。

此外，根据日程安排，将用一整天的时间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中国的学者们将从多角度和我交换意见，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这个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我夫人是我年轻时代曾经影响过我的好朋友的妹妹，我们结婚已经五十多年了，按她的话讲，结婚前和结婚后我都不曾嫉妒过什么人），但是，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中国各地的畅销和热烈研讨，我倒是有嫉妒，所以特别高兴参加为我准备的研讨会。

日程中还包括今天社科院在这里为我组织的这场演讲会，我想你们都能够理解，我最后提到它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日程安排的分量比较轻。

我要说的是,这是继2000年之后,我在这里进行的第二次演讲。那一次,虽然不是我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却是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第一次演讲。

六年前,我在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忧虑,即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我不仅对北京的听众讲过我的这个担忧,也曾提醒过东京的听众:千万不能让日本历史上多次重复的“锁国”再次发生了!事实上,我所忧虑的事情目前正在发生。这次来社科院演讲,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则感到紧迫。因为,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也许没有第三次机会,作为一名对中国知识界抱着敬意的作家,也为了和我抱有同样意念的日本的那些朋友,我要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坦率地说,站在这里讲话的我,心情是沉重的。在这六年里,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保持着亲密的友好交流关系,在我东京的书房里,一直自豪地、珍贵地摆放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证书!

六年来,我的担忧一直挥之不去。长年来我所崇敬的巴金先生以高龄去世了。勇敢、诚实、卓越的文学精神贯穿于巴金的一生,他的人格威严永远闪烁着光芒。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我把我的哀思写在了寄给社科院一位友人的私人信函中,据说被发表在了报纸上,也许有些人已经读到了。在那篇悼文中,我谈到了我的忧虑。

在悼念巴金的悼文里,我对日本政府走向与中国和解相反方向的强硬态度表示了忧虑。就在前不久的八月十五日,小泉首相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当天晚上,早有预感的我和我所信赖的知识界人士组织了大型抗议集会。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应当向大家介绍八月十五日晚间我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面对一千两百多名与我同样忧虑的老人、壮年以及青年人(包括很多女性听众)所演讲的内容。

三

在八月十五日的集会上,我们所有发表演讲的人都事先统一了基调,大家都从围绕政治哲学家、教育家南原繁的思想所进行的分析而展开,同时联

系日本当下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探讨对南原繁理念的理解。

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南原繁是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教授,战后不久曾经担任东京大学的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频繁地对学生和一般市民发表演讲,其中许多演讲在出版后被广泛阅读。演讲的内容集中在战后日本人如何重新做一名国民、重新做真正的人以及如何复兴已成为战争废墟的国家等问题上。

南原繁特别提到的是核武器问题。他说:“经受了长崎、广岛爆炸伤害的、人类第一个原子弹受害国日本,担负着重建自己的和平新国家以及把战争残害的情况和废弃战争的决心告知全世界的义务。这不仅是对太平洋战争应尽的责任和应付的代价,也是日本的出路,是日本民族对世界历史的使命。”

关于中国问题,他表示“决定日本民族命运和未来的,只能是重新建立在真正和平基础上的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它的实现需要一个根本条件,那就是日本国民要对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争责任做出深刻的反省、深刻的认识”。

我只亲耳聆听过南原繁的一次演讲,那是他在1963年12月1日纪念学生出征二十周年时、所作的题为“放弃战争的再次宣誓”。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对那次演讲的深刻印象讲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听。

南原在演讲中谈到,战败前的两年,日军越来越被动,征兵令下达到大学,凡达到兵役年龄的学生都要上战场,即所谓“学生出征”。作为送行的教授,南原繁心情复杂。学生当中有的已经“对战争疑惑和忧虑”。当自己的教授同事对学生继续唱着“大义名分”、“道德意义”的高调时,不能否认有的学生确实已经认识到那是一场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侵略战争。要把这些学生赶上战场,怎么对他们说呢?南原在演讲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如下叙述,我在这里谨引用南原著作集中的原话:

我不能对他们说“即便违抗国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我不敢说。(省略)我对学生讲的是,“国家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不论个人的意志如何,我们必须依照国民整体的意志行动。我们热爱这个祖国,必须和祖国共命运。要知道,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终将经历很多失败和错误。因此,我们的民族将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不过,这些付出将带给我们日本民族和国家真正的觉醒和发展。”

我在8月15日演讲的时候引用了南原的话。当晚回到家里时,已经收到了批评的邮件。发件人认为,南原没有阻止学生出征,而学生中一定有人死在了战场上,而且有许多亚洲人、妇女和儿童被那些出征的学生所杀死。怎么能够允许教授的沉默呢?

这话说得对。面对不得不出征的学生,南原没有说出真正想说的话,对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为他战后行动的动力,他为此而付出了努力。我聆听南原演讲正值战争结束第十八年,南原不得不担心的是,处在战后重建中的日本,本应对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以及对近邻民族带去的更大牺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觉的发展之路”,但是这个“民族国家”却正在淡忘这个自觉……下面再引用他演讲的另一段话:

……向内外宣布放弃战争、废除一切军备的我国,今天在战后同一个宪法下却拥有不亚于战前的二十几万兵力,由此可见建设新日本精神的变化,这一切正是对自己的抹杀、对自我的否定,这么说可能更合适。别的暂且不论,与此关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战后的新教育理念已经发生了动摇和混乱。现在的政府、各政党口口声声自由与和平,但其精神内涵和志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不仅仅是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问题,在我们一般国民中也同样存在,所谓战前派(包括战中派),在战后十八年以来,已经淡化了对战争的反省和战后初期的决心,甚至已经忘却,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南原这种沉重的恐惧在他的另一段长话中表达得十分透彻。请允许我再次予以引用:

就我国自身而言,俨然称为“圣战”、打着肇国精神、“八纮一字”的大旗,称美英为鬼畜,以把他们赶出亚洲取得东亚新秩序的霸权为我民族神圣使命,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岛施行暴虐,残害数百万无辜生命的那场战争,如果不是我们民族的暴举和错误、不是对同胞和人类的犯罪,又能是什么呢!我们所担心的是,现在,对所谓“大东亚战争”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其意义的强调,不论意图和动机是什么,都将导致所谓东亚新秩序亡灵的再次复活,导致毁灭共产中国的战争。实际上,我们的国民中有的人还没有从大东亚共荣圈的梦中醒来,“梦,再来一次吧”的希望仍旧残存。

关于最后这一段引用,特别是对于倒数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担忧,有几个发来的邮件、特别是五六十岁的听众反馈说,南原作为一名谨慎的哲学家,在思考未来时,恐惧的心理常常困扰着他。当时的担忧就是指“毁灭共产中国的战争”。

其实,当今,在与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相处中,尽管日本紧紧追随着美国,一旦挑起战争,无论国土还是民族,首先从地球上“覆灭”的是日本和日本人。这一点连我们当中最健忘的人们(包括那些对广岛、长崎的事件根本不了解、对那些受到光辐射而终生痛苦并已经年迈的受害人的情况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应当想象得到。刚才我讲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讲中透露了两个最大的担心。第一是日中关系的恶化;第二是笼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战后经历了六十一年,与南原演讲的时代相比,为“大东亚战争”和“东亚新秩序”正名的叫嚣更加露骨,在一些报纸上占据相当的版面,尤其是出现在面向大众的电视等媒体上。小泉首相认为自己的行动与这种复古性的论调无关、是个人“内心的问题”,今年8月15日参拜了供奉着“大东亚战争”、“东亚新秩序”思想的具体实施者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之后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有近50%的日本人对小泉的参拜表示支

持。这是战后最大的历史转折点。

我在这里能向大家说的是,8月15日晚我们以南原繁的思想为主题面对一千二百多名认真的听众演讲、我们大家共有着深刻的危机感——这样一个事实,以及将来我们不应当无能为力——这样一个期盼。

四

我作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从少年时代开始,六十多年来一直崇敬着一位中国的文学家,那就是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鲁迅。我最先接触到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在不断接触和阅读鲁迅作品的全部过程中,我从来没有间断做读书笔记,其中包括对鲁迅作品中提到的“希望”这个词语的理解等。实际上,我在很多场合都引用了我的这些读书笔记。无论是最初对鲁迅的话语的解读,还是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认识在不断地加深。下面,我特别想就鲁迅所说的“希望”谈谈我的想法。

如前所述,阅读鲁迅已经伴随我的一生。日本刚战败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我家在四国的山村,没有优厚的文化背景,这种条件下的我又是如何阅读到鲁迅短篇小说的呢?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连我自己也像个谜。因为这次北京之行中我要在北大附中演讲,会提到这件事,所以非常认真地要把记忆中母亲给我的那本很小的《鲁迅选集》找出来。在我的读书笔记上记录了那本书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岩波书店出版,后来又通过书店得知那个版本是1935年出版的。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我也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才听她说的。我母亲的一位从自小要好的朋友,她曾在东京的女子大学学习,接触过中国的现代文学,后来作了教师。在我出生的那年(1935年),这位朋友在探望产后的母亲时,送给了母亲那本鲁迅的书。两年后,卢沟桥事变,日中两军冲突,战争爆发。我母亲害怕周围的监视,把那本书珍藏在了一个小箱子里。把敌国文学家的《鲁迅选集》藏起来了。战争临近结束时,父亲去世,我失去了上中学的希望。记得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为生活奔波的母亲那时已经没有看书的余地了。

但是,战后第二年,新宪法颁布,半年后宪法开始实施的同时又颁布了教育基本法。我们大多数日本人心中所充斥的,就是刚才讲过的南原繁讲座中提到的对新生日本的决心和希望。我讲过,南原是一位依照和平宪法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学者,其实我也是那个改革的受益者。村里办起了新制中学,我高兴极了。我母亲就是在那时把珍藏在箱子里的《鲁迅选集》给了我。那年我十二岁,已经可以读《孔乙己》、《故乡》,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我现在引用竹内好对那一段的翻译。

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这句话,对于当时十二岁的我来说能理解得了吗?我重复着他的话,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但十二岁的我非常珍爱这句话,我觉得鲁迅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我十九岁的时候开始了大学生活,开始阅读更多鲁迅的书。鲁迅所说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为此我不知写过多少读书笔记(仅在新制中学读书时的笔记就有很多册),也多次把他的的话抄录下来。

我在《华盖集续编》里读到一段,我想在这里读给大家。这是那篇悼念被杀害女学生的文章之后,在更加严峻的情况下,鲁迅前往厦门之前向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发表的最后公开演讲,是记录下来的。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仍然记得自己在读了这个谈话后的感想。我特别意识到自己进入大学生活就是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十二岁时对《故乡》的阅读其实并没有理解透彻,曾经在笔记中写过“希望”将怎样才能出现呢?现在,鲁迅面对现实危机,站在犹如一堵高墙的黑暗前,把希望解释得那么透彻。再联想到《故